

系制度性安排的效力,缓和了先前的既有安排与市场体制全球化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营。会议决定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资本金要求,并首次把对冲基金置于金融监管之下,将松散的金融稳定论坛升级为金融稳定委员会。这种全球经济监管体系一旦建立并投入实施,有利于避免金融衍生市场过度膨胀和杜绝恶性投机,确保全球经济运行健康。尽管不少国家已或明或暗地采取保护主义,但会议高调承诺

反对保护主义,有望避免危机导致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紊乱与失控。从国际货币结构看,有关强化特别提款权(SDR)和创立超主权货币目前仍停留在建议阶段,需要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制定可行性技术方案。预计 G20第三次峰会也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提出和讨论问题毕竟为未来适当时机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可望使国际体系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趋于公平合理,未来世界经济运营将展现出更多的和谐与有序。○

大危机催生新秩序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

世界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巨大危机的年代。在不到一年内,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规模至少占世界 GDP 比重一半的事实说明,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的影响有多严重,而且它还会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对这场危机最终结果的研判还嫌过早,但无论从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人们日常生活而言,这场危机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可能超过自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经历的任何一场危机、冲突、战争和灾难。

危机与动荡年代也是调整与变革年代。这场危机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渴望与动力,推进一种更能反映世界形态与力量变化的世界秩序调整,而这种或多或少成功变化的前提,在于对现行国际秩序与机制的功能与效用进行深刻与充分的反思。

冷战结束不仅使东西方在紧张对峙的安全问题上松了一口气,也唤起西方对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若狂般欣喜。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顶礼膜拜使西方世界对“政府与市场作用”孰是孰非有了一个基本的倾向,即市场是万能的。凯恩斯主义混合模式一度的辉煌与最终的失败,更加剧了西方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狂热,任何强调政府作用在政治上甚至都有与共产主义沾上边的嫌疑。而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全球化加快发展,贸易、投资与金融自由化掀起滚滚红尘,确曾带来世界经济持续近 30 年曲

线向上的繁荣轨迹。“政府是坏事,放松监管的市场是好事”几乎成为铁定的信条。世界范围内投机心态膨胀,有限资金过度的倒腾,使金融这一本是支撑现代经济的核心力量不只是无限地膨胀,而且成为远离实体经济虚拟的游魂,变成少数“精英”阶层呼风唤雨的游戏。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支撑了西方世界为时不短的黄金岁月。这种秩序不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尼克松冲击”下依然得已存留,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奔向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成为后进国家前进时听命的神符。冷战后,全球化曾塑造了人类发展奇迹,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美国利用世界范围资源配置如鱼得水,其综合国力在世纪之交一度达到可能是空前的“单极时刻”。中国更早洞察到世界可能的变化,在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这种战略决断使得人口超过 10 亿的中国在 20 世纪最后 30 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国家发展与经济跃进的空前纪录。加上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崛起,非西方力量成为当今世界变革的重要角色。

但是,现存国际秩序没能充分反映新兴力量崛起的现实。美欧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势的垄断性把持,没有为后进国家带来大面积减少贫穷与稳定发展的持续希望。仅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为例, 66% 被分配到西方国家, 更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只分得零头。全球化造就了其引领者, 带动了新兴大国崛起, 但同时世界秩序的不公正也造就了世界的边缘地带与破碎地区, 加剧了恐怖、极端、犯罪等不良主义的滋长与发酵, 进而威胁世界的持续发展与安全。而金融海啸引发美国的高空“跳水”, 无疑不仅使新兴大国, 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深度被套的命运。

全球秩序作为建立于实力基础之上的体制架构, 可能远离一般百姓的生活及话题。但中国精英界当有一种紧迫的良知, 不只是基于中国, 也是基于人类发展前途, 来推动国际秩序更能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构建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场不可能永远推迟的危机可能来得正是时候, 其中包括的机会就是要调整与变革旧机器, 何况在东方与西方之间, 这种改革并未有原则上的重大分歧。

一种新秩序的建立必须对政府与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功能进行更为清晰的诠释, 对全球自由化进行有效监管, 对旧机制进行反思、调整与基于协商的改造。首先是在联合国范畴。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织, 但世界发展确非 50年前的样子, 大国之间的战争也确实不可想象, 各国主权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大有变化, 除领土主权、政治主权外, 经济金融主权、文化主权等同样是重要也最易被外力所侵蚀的方面, 而这也是斗争的新领域。

世界的真正变化在于, 在全球化时代, 不论意识形态、社会体制与发展水平如何不同, 各国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大国间发生传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隐退, 但经济金融文化甚至社会领域依然可见巨大的危险。既如此, 除联合国安理会外, 可否建议联合国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置换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功能, 突出其权威, 设立差不多具有安理会功能的联合国经济安全理事会? 这是一个基于各方政治协商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协商机制, 在宏观层面共商全球发展与稳定, 不带歧视地探寻世界有效发展的模式与运用, 宏观政策的协调与指导, 加强金融监管, 加大经济风险预警功能,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它是经济组织, 但超越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专业机构。这种机构或组

织涉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变更, 决策机制具有广泛性与代表性, 决策内容具有综合性, 对政策的指导具有权威性。联合国经安会是经济层面的安理会, 其地位亦可视为与现有的安理会相当, 考虑到人口、地理、经济规模、发展潜力与经济影响等因素, 同样可以设立常任理事国, 以平抑一些出钱多的国家一个劲地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挤的局面。但是不是一票否决制可再行讨论。也可以设立非常任理事国。它需要重新确立一些新的原则, 承认世界发展与模式选择的多样性, 尊重公平与正义等。

其次, 国际协调机制同样需要调整。现行机制或发端于冷战, 或出于自发组建。G7/G8峰会本来着眼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 但其功能不断弱化, 成为一年一次集体亮相的摆设; 近年吸收了一些新兴大国参与, 却始终撕不下政治与意识形态面纱, 不仅在经济上无为, 还撕裂了经济与安全的关联。

人类面临日益增多的新型挑战, 包括气候变暖、环境保护、传染病扩散、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不是抱持所谓民主理念基础上确立的机制所能有效应对的。有鉴于此, 美国学者曾经倡导成立 G4 (美、欧、日、中), 但昙花一现, 无果而终。布热津斯基等人甚至提出过建立“中美两国集团”(G2), 但引起一些国家忧心忡忡。G20代表着占世界 GDP 85% 的总量, 其中既有西方国家也有发展中大国, 应该说最有代表性。但 20个成员半天会议, 一方的发言可能不到 10分钟, 其台前幕后政策协调的难度可想而知。如今伦敦金融峰会围绕救市、金融监管、宏观政策协调、贸易与发展的事先磋商, 矛盾与困难重重, 美欧之间、欧盟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较为明显的分歧。G7和 G20可能成为危机年代过渡性的机制, 劫后余生的世界需要新的大国集体主导。相对于联合国经理会这种多边机制而言, 大国集体主导的机制是一种国际机制, 它具备协调与引导功能。可以设想为 G10 包括美、中、日、欧(德法英)、俄、印、巴、南非等在内的国家需要有新的政治勇气置换新的协商平台。正如巴西总统卢拉 3月 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所言, 期望这次危机能催生“一个崭新的、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

其三, 原本在平等与诚信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市

场经济,由于其发展与演变,变成了一种不尽合拍的全球集体舞。维持西方的主导是不公正的也不合时宜,指望公司、企业或民族国家自律可能是一种奢望。在市场经济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新时代,世界同样需要建立新的原则性契约。

大危机会催生大调整。当然,一种秩序的转变甚至是一种机制的建立,过程会是漫长的,它绝不是一个简单推倒重来的过程。在既有机制的使用价值得到充分释放之前,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对一种新秩序的期待与建构不应畏缩,世界需要加快寻求共识与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实现,将成为此

次危机可能孕育的重大历史遗产。

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同样是利空,危机时代对处于上升期的中国而言,蕴含着大机遇。中国的崛起在于顺应全球化,主动融入世界,而不是在试图颠覆既有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中国总有一天会崛起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国,如果届时承继的仍是一个差不多百年前建立的旧世界体制的外壳,当可以想象否?在世界呼唤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更时,中国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当逢其时,当应有所作为。○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赵晓春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自 2008 年爆发以来已迅速波及全球,并由金融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无一幸免,“金砖四国”均遭受程度不同的打击。经济学家和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这是自 1929-1933 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经合组织(OECD)将这场危机定性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覆盖面最广”的“一轮衰退”。鉴于 1929-1933 年大危机在促成二战爆发和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有理由关注这场给予世界经济政治以巨大冲击的危机将对国际体系的演变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历史角度看,国际体系变迁的根本动因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主要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国际体系的转型往往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的。在认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区分危机的方法,依其对国际体系变迁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直接或重大影响的一次性危机,一类是尚不足以导致国际体系转型的可以克服的周期性危机。前者最具代表性的即是 1929-1933 年

大危机。正是这场大危机,直接引发了西方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激化了凡尔赛体系的内在矛盾,催生了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加速了二战爆发和国际体系转型。此外,导致两极体系崩溃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苏联解体,亦可视为一场一次性危机,即苏联自身深刻的经济危机直接诱发了政治、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致使整个苏联陷入难以平抑的总危机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从后一类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仅大型危机就有 20 次左右,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影随形。但这些危机在通常情况下,并未引起国际体系的转型,而是在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的循环往复中显示出周期性特点。周期性危机的结果是导致体系恢复平衡,但这种平衡又不是简单地回到危机前状态。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周期性危机都以渐进、累积方式推动着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的发展,改变着体系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对国际体系产生深刻的趋势性影响。这也是我们何以必须高度关注周期性危机对于国际体系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际体系变迁的角度考察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场危机究竟是一次性危机还是周期性危机?根据当前金融危机实际产生的影